

论马克思关于人性假设的三个维度

□武建奇

(河北经贸大学 河北 石家庄 050061)

人性假设是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有什么样的人性假设,就有什么样的适合这种人性假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意蕴。马克思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有三个维度:哲学层面上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经济层面上人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资本主义经济层面上人是阶级人。从方法论上看,阶级人假设与经济人假设的不同导致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根本观点的不同。

关键词:人性假设;方法论意义;马克思经济学;阶级人假设;理论指向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3—0005—09

一、人性假设的理论意义

经济学研究离不开假设,假设就是在一项研究之前首先需要明确的约束条件,它们是经济学家进行逻辑推理和演绎过程的基础。

基本假设构成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前提,它是指经济过程中的一些最基本的、在研究者看来应该属于“公理性的”无须证明的事实,经济学家将之抽象出来,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如对人性的假设、对稀缺性的假设、对有无交易费用的假设等。这类假设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和约定,是大前提、“大假定”,也是根本性的,不能随意改变,其作用贯穿于一种理论体系的始终。基本假设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隐喻的;可能是自觉的、有意识的,也可能是不自觉的和无意识的。

比如,在西方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是个基本假设,几乎所有西方经济学著作都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但并非所有作者都要明确指出这个假设的存在。读者对隐喻的公理性假设是“自然接受”的,他们把明示的和隐喻的基本前提假设同样看待。经济学对交易费用的认识是新制度经济学产生以后的事,在此之前西方经济学的长期发展中实际上存在一个十分重要但人们并没有认识和意识到的基本假设——零交易费用假设。人们并不知道也不必知道何谓交易费用,就接受了“零交易费用假设”,“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1]90-91},把所有理论都建立在这一假设之上。零交易费用假设,就是新古典经济学中隐喻的甚至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却不知不觉中遵循着它的要求的基本假设,先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从来没有明示过这一基本假设,相反,它是由对新古典理论提出挑战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宣称它的存在的。

人性假设是经济学的前提。科斯说：“过去，经济理论一直因未能清楚地说明其假设而备受困扰。在建立一种理论时，经济学家常常忽略对赖以成立的基础的考察。”^{①②} 人性假设就是科斯所说的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基础”之一。经济学要研究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是人的行为选择的学问。^③ 所以，建立经济学理论体系首先就要对“人是什么样的人”作出判断，对人性进行假设，然后，才能研究由人性所决定的人的行为及其规律。人性决定人的行为动机，行为动机决定人的行为及其方式和特征，形成人的行为规律，根据人的不同行为规律，才能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在这个因果关系链中，人性假设对经济理论起着基础性的决定作用。有什么样的人性假设，就有什么样的人的行为和行为规律，也就产生适合这种人性假设的经济学理论。

一定的人性假设（如经济人或阶级人，自利人或利他人等），一方面确定了某种经济学理论所研究的人的“属性类型”，把作为“多样性统一”的复杂的现实人、具体人，抽象为只有一种属性的人，将其限定在一个相对狭窄的活动范围内，这样，便于进行经济学的逻辑演绎和推理，把握规律，建立理论。可以想象，如果作为经济学假设的人既自利、又利他，既是个体经济人、又是整体阶级人，他有着截然不同的行为动机和行为特征，那么，这样的人的经济行为就会呈现出某种随机性，对其“规律”的研究就只有统计意义而没有逻辑意义，从而，经济学理论根本不可能建立。

另一方面，一定的人性假设又排除了假设外的其它人性，这可能产生两方面的结果：一是使一种经济理论不必对其他各种人性假设下的所有经济行为都进行研究，而专注于一种特定人性假设下的经济理论的深入、细化，推动一个个各不相同的经济学流派和理论的兴起、成长，从而有利于经济学的发展繁荣；二是一种人性假设排除了人的其他属性，在深化了对人的某一种属性下经济行为研究的同时，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舍弃了人的多样性属性，使人的丰富多彩的经济行为不能被完全地圆满地得到解释，甚至于出现重大遗漏，使人的某些行为规律失去解释力。如长期以来正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在许多方面是有解释力的，但正如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所言，“人类行为比经济学家模型中的个人效用函数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复杂。有许多情况不是一种财富最大化行为，而是利他和自我施加的约束，它们会根本改变人们实际做出选择的结果。”^④

这里有必要指出，人性假设对于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其意义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而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更不是规范性意义上的。换句话说，经济学人性假设的理论意义不过是说明，“如果人是这样的人”，那么，他就会按照这种经济学所揭示的行为规律来行事。人性假设只是为建立理论提供必要的“人性”前提，而不是把人性作为研究和评价对象，不是为了用人性理论去说明现实中的人究竟“应该是怎样的人性”问题，更不是要强化、去培育某种人性，或者去改造现实中的人性。

总之，作为经济学前提假设的人性和希望现实中有什么样的人性，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人性假设是逻辑推演的起点，但它本身却是“实证性”的：它只强调作为理论前提的人“客观上”（一旦理论上对人性类型作出假定，逻辑推演就必须遵循之）是什么样的而无须证明其原因，也不对这种人性作出肯定性或者否定性评价；而对待人性的态度，则属于规范范畴，它不是首先把所假设的人性作为一种客观存在

①过去，人们习惯于认为只有马克思经济学出于意识形态原因和阶级斗争需要才研究人的生产关系，西方的“纯经济学”却只研究生产中“物”的方面。现在，新古典经济学“见物不见人”，只关注经济过程中的“物”而忽视“人”的传统，即使在西方也正越来越受到批评。比较典型的是著名产权经济学家巴泽尔的批评，他说：“对一个工人来说，努力是在他控制下的一个变量”，效率是人的积极性的函数，经济正越来越失去其“技术单纯性”而成为人的问题”^{③⑥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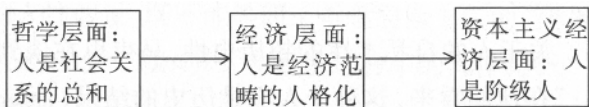
②转引自蔡翔、陶学禹：《经济学中人性假设的历史变迁及其启示》[J]，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65。

和既定条件予以承认和遵循,而是把人性作为“改造对象”,去试图解决“人应该怎样”的问题。如果混淆了作为前提假设的人性和作为“改造对象”的人性,就会对作为理论前提的人性假设作出误解或误用,使人性假设失去其本应具有的研究方法论意义和作用。^①

二、一般人性：“社会关系的总和”

日本经济学家繁人都重引用希曼(Heimann)教授的话说:“马克思为我们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最具综合性、给人印象最深的范式。所以,马克思经济思想之于现代经济理论的意义变成了一个方法论的问题。”^[4] 我认为,马克思确实对人的行为动机、行为特征和行为规律有深刻研究,这有赖于其对人性的基本假设。马克思经济学是建立于他的人性假设基础之上的。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人性论进行了无情批判,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人性假设。马克思对人的基本假设总的来看是分层次的,是抽象和具体的统一,其人性假设有如下逻辑层次关系:



马克思关于人的基本假设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经济人假设”根本不同,也应该不同。人性假设是经济学理论的逻辑体系得以建立的前提条件,有什么样的人性假设就会有怎样的适应人性假设下人的行为动机和行为规律,从而会产生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也就有着不同的政策意蕴和含义。

“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5] 马克思经济学的创立,其宗旨是服从于他的历史使命的,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截然对立,因此,不可能使用以资产阶级人性自私论为哲学思想基础的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创立的劳动价值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创立了无产阶级的经济学,但对‘经济人假说’却采取了批判和否定的态度。马克思对人的研究没有沿袭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说’,而是将人置于社会经济形式的产生、发展和变化之中,探讨人自身的发展规律性。”^[6]

马克思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哲学家的“人性自私论”和经济学家的“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确立起他的人性假设的。这种批判主要涉及到资产阶级学者关于人性的“孤立个人”、自私本性的超历史的永恒性等方面。

关于“孤立个人”,马克思说:“人即使不是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1] 另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更详尽地说:“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鲁宾逊一类故事,这类故事决不像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样,仅仅表示对过度文明的反动和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样,

^①把经济分析前的“人性假设”混同于一定价值判断下的“人性取舍”的情况并不罕见。杨天宇在《评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7]一文中说:“如果我国公民全都按‘经济人’的方式行事,那么就将对我国公有制经济构成严重危害。”“经济人”的普遍化不仅不意味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善,而且会对我国公有制经济构成严重危害。”应该用什么来代替“经济人”呢?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中的基本行为假定应是“集体功利主义者”。很显然,这里的所谓“经济人”实际上已经不是作为一种理论分析前提条件的“人性假设”,而是把“经济人”本身当成了分析对象、改造对象;不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中首先把人“看作是什么”,而是要按照作者“应该不应该”的标准对社会主义经济过程中的“人性”进行选择。

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也不是以这种自然主义为基础的。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时，“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好像人是孤立存在的。但“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8]1-2}

关于人的自私本性的超历史性，马克思在谈到斯密和李嘉图对人性的看法时认为是一种“错觉”，他说：“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8]2}另外，“马克思则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将利己主义看成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人在本身的发展还存在着‘物的依赖性’的社会背景（指的是私有制商品经济）下表现出来的特征。马克思认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人的自我实现表现为三种历史形式：一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个人从属于集体，人的自我实现表现为个人的自我牺牲；二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人的自我实现表现为利己主义；三是在共产主义社会，由于‘人的依赖性’和‘物的依赖性’消除，生产力高度发展，个人的自我实现表现为个人本身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和谐一致。马克思的分析表明，人的本性是不断变化的，是一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环境规定了经济活动中人的本性和本质，而不是相反——将人性看作一个先验的存在和永恒的范畴。”^[9]

不破不立。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和经济人假设的同时，也深化了自己对人性的思考，建立了马克思独到而深刻的人的本质理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并不是从本体论意义上对人的本质的规定，而是从方法论意义上对人的本质的规定。^{[10]228、262}

国内外都有从人的自然本性来论人的本质和人性的观点，颇有些“人性本体论”的味道。中国古代思想家从“五行”（金、木、水、火、土）以及“气”来推论人性，古希腊思想家从“水”或其他自然要素论说人性，近代西方思想家对人的自然属性的强调更加突出，如弗洛伊德就从“性”这个人与动物共有的自然机能来规定人性。^{[10]262}

而马克思则认为，人的本质只能存在于人的社会存在及其关系中，没有人的社会存在就没有人的本质。只有从人的社会存在和活动的大量现象中，才能概括出人的本质规定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了人的本质：“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11]18}

应该指出，这里，马克思对人的本质所做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规定，仅仅是从哲学层面上对人性的最一般、最抽象的考虑，远远不能作为对经济学基本假设前提中“经济人”的直接替代，但“社会关系总和”这一人的一般本质的提出，为我们提示了马克思经济学中人性假设的思路——人的“社会关系

总和”的本质需要一步步具体化。

三、经济层面：人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

哲学层面上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有着太过广泛的内容，如经济、政治、文化等等，寻找能够作为经济学研究前提假设的人性，在方法论上，就必须把人的本质从哲学层面过渡到经济层面，把抽象的“人的本质”具体化为经济学上的“人性”或“人格”，以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关于人的行为动机的起点。

抽象的“社会关系”存在于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等具体关系之中，经济关系等具体关系又表现着抽象的社会关系，抽象的人的本质蕴藏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具体人性之中，经济等方面的人性又体现着抽象的人的本质。作为经济学分析前提的人性假设，既不能等同于哲学层面上人的“社会关系总和”这一“类本质”，又必须确实实是哲学层面上人的这一“类本质”在经济过程中的具体化。

人的本质在经济过程中的具体化形式应该是什么呢？

这还要从马克思的方法论上来考察。繁人都重在《制度经济学回顾与反思》一书中谈到马克思的方法论时写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最大特点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强调区分和整合‘现实’（real）的和‘价值’（value）的一面。”“社会生产现实的一面是实物（Physical）的，它超越了社会经济制度的具体形式，而价值的一面则因其反映了某一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而是社会性的。”^{[41]、2} 繁人都重在这里提示我们，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是“二重的”，即区分和整合“实物的”和“价值的”这两个不同方面，这个方法论提示的重要性在于，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思路对马克思的人性假设“按图索骥”。已如繁人都重所言，马克思经济分析中价值的一面是“社会性的”，在经济领域里当然就是生产关系或生产的社会形式，其中实物的一面是“物质性的”，是与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相对应的实体形式，它又有两种不同具体的物质形式，一个是生产中物的要素即生产资料及生产成果商品，另一个是生产中人的要素即劳动力或劳动者。物和人，在生产中起着性质不同的作用，但在马克思的“二重性分析”中，它们对生产关系的关系却是一样的——都是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物质承担者。

马克思在说明商品二因素时说：“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即物质形式，生产资料或物质商品——引者注）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1]48} 这里，在物质与价值即社会生产关系的关系中，前者是后者的承担体。

同样，马克思在分析社会生产过程二重性时，也总把人这个“实物性要素”看成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物质承担体”。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谈研究方法时，马克思明确写道：“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12]207-208}

这里需要解释的是，马克思的“经济范畴人格化”中的“经济范畴”含义如何呢？

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明确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11]108} 在《资本论》第1卷“交换过程”一章中马克思直接用“经济关系”替换了“经济范畴”，他说：“在研究进程中我们会看到，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的。”^{[11]103} 显然，这里马克思的“经济范畴”指的是真实的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的理论抽象形式。因此，

马克思是把人看作二重的:作为生物意义上的人,是他的有骨有肉有生物需求的物质实体;作为社会关系总和意义上的人,在经济过程中则是社会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的承担者。

在《资本论》第1卷关于“资本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一节中,马克思对此有个间接解释。他说:“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这种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11]⁹²⁻⁹³ 马克思的意思是,这些掩盖了社会中真实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物与物的关系本来是“虚幻”的、表面的关系,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只追求利润(虽然它背后也隐藏着人的关系)这些物质目标的条件下,那种“虚幻”的关系恰恰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经济范畴,而且在那个“虚幻”关系笼罩的社会中,这些范畴对资本家是“有社会效力”的,是“客观的思维形式”。这正与马克思在评论资产阶级对生产和交易关系的看法时曾说过的情况相类似:西方经济学“不是把生产方式的性质看作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交易方式的基础,而是反过来,这是和资产阶级的眼界相符合的,在资产阶级眼界内,满脑袋都是生意经。”^[13]¹³³⁻¹³⁴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所说的人是“经济范畴人格化”也可以理解为资产阶级经济学上“虚假范畴”(它虽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表面现象的写照,但却是资本家的“客观思维形式”)的人格化,自私自利的“经济人”不正是惟利是图的资本家贪婪吮吸雇佣劳动的剩余价值这一经济关系的表现吗?

总之,人的一般本质具体化在社会经济过程中,在经济学假设前提意义上,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就是说,作为经济学上的人,肉体只是他的身,经济关系才是他的魂。他不是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也不是孤岛上的鲁宾逊,而是处在社会经济关系网中的人——经济关系这种客观的但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要附着在有着具体的生命形式的人身上,经济关系发展的客观要求要由它的有生命的承担体即人的活动来体现,而人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式处处受到他所处其中的社会客观经济关系的决定和制约。

四、阶级社会的经济层面:“阶级人”假设

人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这是马克思的哲学层面上人的本质——“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经济过程中的具体化。它也可以看作是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但还不是最具体的人性假设,因为,马克思经济学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它不同于“广义经济学”对所有各种社会形态——包括阶级社会和无阶级社会经济过程的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过程时,还应当把“经济范畴人格化”这个一般经济过程的人性假设,进一步具体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否则,在人性假设上可能犯“逻辑不一致性”和“以一般代替特殊”的错误。

马克思的“经济范畴”在这里就是指社会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中主要地表现为阶级关系,或者说,阶级关系是阶级社会中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正如恩格斯所说:“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12]¹²³ 因此,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经济范畴人格化”就必然表现为一个新的人性假设的范畴——阶级人。

所谓阶级人,就是说在阶级对抗社会中单个的个人是以他所在的那个阶级整体中一员的身份存在的,他的身份是由阶级共同体成员的关系来定义的,离开这个团体也就不存在这种身份。作为阶级关系的物质承担者和阶级范畴的人格化,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个人只是整个工人阶级系统中的一个要素,

而要素的性质和功能是由阶级系统结构“整体地决定”的,所以,他并不仅仅代表他个人本人,他是阶级的化身,有着阶级的灵魂。“这种理论对于熟悉马克思的中国经济学家来说本不该陌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根本的‘精神实质’,就是把社会分成不同的特殊利益集团(‘阶级’):不承认天下存在‘共同的爱’,而只承认‘阶级的爱’。”^{[14]264}

我们从哲学意义上人的“一般本质”(社会关系的总和)演绎出经济过程中的“特殊人性”(即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而这又是所有社会经济过程中的“一般人性”),再演绎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过程中的“个别人性”(阶级人),这是符合马克思的人性分析方法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写道:“假如我们想知道什么东西对狗有用,我们就必须探究狗的本性。这种本性本身是不能从‘效用原则’中虚构出来的。如果我们想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15]669}“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人的一般本性即本质,“阶级人”就是随着“时代历史地变化了的人的本性”。

马克思经济学中的阶级人是具体和抽象的统一。这种抽象既不像人性自私论那样把人的本性抽象到与动物相同的过度抽象层次,恩格斯说“马克思把存在于事物和关系中的共同内容概括为它们的最一般的思维表现,所以他的抽象只是用思维形式反映出已存在于事物中的内容。”^{[15]666}他研究的“不是处在某种虚想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①这种具体也不是没有经过抽象的现实中的单个的个人,马克思把单个人的欲望、动机看作是多种多样的,要在这纷繁复杂的人类行为中寻找起支配作用的内在的本质的规律,必须运用一定的“抽象力”。

刘永佶教授在谈到人性时说:“人的社会性在阶级社会中具体表现为阶级性,以及更为具体的集团性。”“阶级性也恰恰集中反映了人的各种基本社会要素之间的统一。……当我们将阶级性规定为人的社会性的具体形式时,可以说是已经抓住了人性在阶级社会的主体内容。”^{[10]265-266}

马克思关于阶级人的人性假设是他的阶级分析方法的基础,后者则是前者的必然发展。马克思一经抓住了阶级社会中人的阶级本性,便把它作为对人的行为动机研究的一个基本前提,把阶级人的行为看作是阶级人内在本性和心理动机的外部的动态表现,因而,他对阶级社会中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也必然会采用阶级分析方法,使马克思经济学带有十分鲜明的阶级性色彩。

五、阶级人和经济人:不同人性假设的理论指向

人性假设是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基础”,有了一定的人性假设,才有适合这种人性假设的经济学理论。马克思的阶级人假设和西方的经济人假设,已经预示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因为经济学直接以人的经济利益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且经济学家把自己也置身其中,其理论结论也与研究者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其理论会影响到研究者的利益,反过来,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研究者也可能有意识地“选择”他的理论。社会上的人,无论怎样超脱,都不过是经济利益关系的人格化,经济学家也一样。经济学家在创立理论之前“选择”其理论的人性假设时,已经预先受到其“利益倾向性”的摆布,在此基础上所创立的理论不过是其“利益倾向性”的一种“经济学表达”。以阶级人假设为前提的马克思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转引自林岗、张宇主编.马克思主义与制度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139.

经济学与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西方经济学,正是两种不同的利益倾向性的不同的经济学表达。这充分表现了不同的人性假设的不同理论指向。

另外,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不同,也决定了不同的经济学理论要求有不同的人性假设作前提,在这一意义上,对人性假设作何选择取决于有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而不是相反。马克思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8][11]}研究过程在先,它是个去伪存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倒推”(追溯事实的前因)过程,是探寻真理;叙述过程在后,这是个在思维中“复原”现实、由抽象到具体,借助逻辑说本质的演绎(导出过程的结果)过程,是叙述真理。这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进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8][18]}发现真理是“研究过程”的结果,阐明真理是“叙述过程”的任务。服从于“叙述”真理的方便和需要,必须赋予理论以特有的人性假设作为前提,或明示,或隐喻,以“演示”理论,“演绎”真理,达到“还原”具体,使“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的效果。这里,经济学理论的人性假设,在“研究过程”中表现为结果,而在“叙述过程”中则表现为前提,但对这个“前提”究竟作怎样的假定,又服从于怎样有利于充分地展示理论。所以,从这方面看,经济学不同的人性假设预示着不同的理论指向。

比如,马克思的阶级人假设强调人的社会性、阶级整体性、历史性,而西方的经济人假设则强调人是孤立的个人的永恒性,都有明确的理论指向。马克思试图通过阶级人概念把阶级社会中的人置于以阶级的划分为基础的基本制度结构中,用阶级结构,归根到底是用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来说明不同人的社会地位高低和财富分配形式的成因。而西方经济学则试图通过“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经济人概念来回避阶级结构问题,强调个人利益、个人行为、个人理性,害怕阶级人基础上的集体利益、集体行为和集体理性,把任何“组织问题”都力图“还原”为个人行为问题,认为不可能有统一的利益一致的集体行动,并把这归结为“集体行动的逻辑”。^[16]

再比如,在阶级人假设下,马克思借助于物与物的关系重点研究了被物的关系掩盖着的人与人的关系。而作为西方经济学假设前提的“经济人”实际上并不是“人”,它无血无肉无感情,更不体现人文精神,只是个追求资本增殖的经济动物。西方经济学声称不涉及政治,无意识形态,只研究纯粹的技术问题。在这方面,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是走了弯路的,它已经为自己长期沉迷于对物的关系的留恋,忽视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的研究付出了代价,在外部性问题上碰壁以后才“回过头来”被动关注人的关系。但它总是站在生产资料所有者立场上“见物不见人”,片面强调“物”的重要而淡化人的作用。起初它只研究物与物的关系以及人与物的关系,但却把人与物同等看待——人只是被当作同物没有区别的“生产要素”来研究,即活生生的劳动者被作了“拟物化处理”。^{[17][97]}后来,在处理“外部性”问题时,当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再也无法回避而正式进入其理论时,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又不幸地成为了资本家防止“偷懒”的监督对象。^①是防止劳动者偷懒,还是对抗资本家榨取,成了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总之,人性假设对经济学是重要的,不同的人性假设会导出不同的经济学理论。马克思的以劳动者利益为核心的经济学是与其阶级人假设相适应的。

^①西方产权理论中对旨在防止工人“偷懒”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与泰罗制有“异曲同工之妙”。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2]罗纳德·哈里·科斯. 企业、市场和法律[M]. 盛洪、陈郁等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
- [3]巴泽尔. 产权的经济分析[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 [4]繁人都重. 制度经济学回顾与反思[M].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6]于祖尧. 必须破除对“经济人假说”的迷信[EB/OL].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8851>.
- [7]杨天宇. 评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J]. 探索(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2).
-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9]程恩富,张建伟. 西方产权理论的哲学审视[J]. 经济经纬,1999,(2):14—16.
- [10]刘永佶. 劳动人道主义[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3]马克思. 资本论(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14]樊纲. 经济文论[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6]曼瑟尔·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 [17]裴小革. 新自由主义产权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比较[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04,(2),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收稿日期 2008—02—22 责任编辑:肖磊)

On three dimensions of Marxist humanity hypothesis

Wu Jianqi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 Business Shijiazhuang, Hebei, 050061)

Abstract: Humanity hypothesis, which is determined by economic theori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 is one of the basic hypothesis of economics. Marxist economic humanity hypothesis has three dimensions: philosophically, man is the sum total of social relations; economically, man is personified in economic categories; based on capitalist economy, man is class man. In terms of methodolog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lass man hypothesis and economic man hypothesis leads to the divergence in basic viewpoints between Marxist economics and western economics.

Keywords: Humanity hypothesis, Importance of methodology, Marxist economics, Class man hypothesis, Theoretical guidance